

N 本期聚焦

扭转“脱实向虚”
亟须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

黄群慧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本、富民之基。但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加大，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从2001年的4.7%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8.4%，2016年初核算结果也是8.4%，这已超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美国不足7%，日本也只有5%左右。

二是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实体经济口径计算，从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2016年初核算结果是64.7%。

三是从上市公司看，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这意味着金融板块企业超过了其他所有上市公司利润之和。麦肯锡最近一份针对中国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国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利润80%由金融企业拿走，而美国的经济利润只有20%归金融企业。

四是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而且在货币供应量连续多年达到12%以上、2011年到2015年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倍数从1.74倍上升到2.03倍比例的情况下，面对充裕的流动性，制造业资金却十分短缺、资金成本较高，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大量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乐于在虚拟经济中自我循环，金融

业过度偏离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本质，虚拟经济无法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种“脱实向虚”现象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造成这种供给结构性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虽然有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部门具有垄断地位、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房地产顶层设计缺乏和房地产市场亟待规范等众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不高进而引起实体经济自身供求失衡、无法提供高回报率。

在经过了快速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实体经济规模已十分庞大，然而我国是实体经济大国却不是实体经济强国，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还不高，一个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这意味着，面对随工业化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而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实体经济的供给要素和供给体系已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实体经济供给要素看，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制造业工人亟待提高素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以及智能化工厂里的机器人还比较缺乏；物质资本急需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还较高。从实体经济供给体系看，在产品供给质量上，部分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度、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连续多年居欧美通报召回之首，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表现在企业供给质量上，存在大量



冯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僵尸企业”，优质企业数量不够，尤其是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表现在产业供给质量上，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虽增长迅速但在整体中占比还不高，在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

因此，解决“脱实入虚”问题，关键在于加大力度推进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或者说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没有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低端和无效供给过剩，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由人口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主导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所形成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必然会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下。这一方面会

导致大量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下，大量的消费力量和制造业投资将转向国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会出现经济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但效率反而降低的“逆库兹涅兹”问题。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效率下降会加大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不仅是扭转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需要，更是决定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必须从这个高度认识提高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的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

N 学者观察

经济新常态下的
职业结构新特点

曾湘泉 毛宇飞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新常态时期。在此期间，传统行业不断优化升级，新经济行业纷纷创新涌现，“互联网+”跨界融合快速发展，带来了我国就业市场中职业结构的一些新特点，具体表现为：

总体就业形势趋好，职业两极分化矛盾突出。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我国就业市场前景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企稳回升，全年GDP增速达6.7%，就业市场前景指数由一季度的1.71增长为四季度2.41，总体就业形势逐渐趋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职业及行业间的招聘需求与求职供给不平衡原因，造成就业结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突出。例如，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物流服务、证券期货和软件开发等职业招聘需求旺盛，就业形势相对较好；而环境科学、项目管理、物业管理等职业人才供给充足，但企业招聘需求有限，因而就业形势相对紧张。

新兴行业人才供不应求，传统行业求职竞争较大。随着各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融合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利好政策的大力扶持，互联网/电子商务、基金/证券、交通运输等新兴行业，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人才供不应求，表现出较好的就业形势；与此同时，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包装/造纸、石油/石化/化工等传统行业，受经济增速放缓的下行压力，以及产业升级转型进程缓慢的影响，多数企业采取转岗、分流、提

升人才需求不断上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引导下，部分企业正在经历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主的机制转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融合的结构转型，以及承担国家战略、顺应全球农业模式创新、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化升级等企业转型初见成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我国正从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过渡，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不断上升，一些全球化程度高的IT服务、软件服务、研发服务及金融服务等企业也正吸收大量的高等教育劳动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

观点集粹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宪在《解放日报》刊文指出：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

品和产业，即为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在现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

如何把综合国力转化为话语优势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指出：要从西方舆论的包围圈中“解套”，在根本上就要将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转化为平等的话语权甚至话语优势。促成这种转化，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第一，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总结和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在与西方的比较中阐明

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第二，要利用增强的实力加强媒体和传播渠道建设，更要增加资源投入“话语质量”的建设，如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等等。第三，做一些扎实的增信释疑工作，将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合理性通过恰当的途径向世界阐释，消除误解、赢得信任。

诗词传承，关键在“扩群”

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在《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毋庸置疑，诗词在当代是“小众之小众”的文化。孔子将诗的社会作用总结为“兴观群怨”，“兴”是启思与抒情，“观”是观照与认知，“怨”是指责与批判，均属创造审美层面；“群”是交流思想情感、交换见解看法和实现社会交际，属于接受审美层面。如前所述，经典诗词的“兴”“观”“怨”大多接通了古

今，当代诗人的“兴”“观”“怨”同样贴近了现实，诗词之所以仍摆不脱“小众之小众”的处境，根本的问题出在“群”上。传统文化的衰落、低俗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主流文化语境的巨变导致诗词“群”的功能极度衰落。“兴”“观”“怨”一旦失了“群”，便失去了承载，失去了从个体精神转化、扩延为社会精神和公共文化的可能性。所以，当下诗词传承发展的关键便是如何实施“扩群”。

为什么小微企业很难留住年轻人？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黄宇虹在中国干部学习网刊文指出：为什么有些小微企业中员工的辞职率很高？而有些小微企业未发生员工辞职？追根究底是员工素质与薪酬待遇之间的双向匹配所致。合理的薪酬与激励机制是决定员工“留与走”的重要因素。较低的薪酬与较高的晋升机会均会促使员工辞职，如果仅考虑有员工辞职的小微企业，随着辞职率的上升，薪酬待遇水平与职务

晋升机会逐渐下降。然而对于没有员工辞职的小微企业而言，反而为员工提供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薪酬待遇。综合员工素质与薪酬激励，由于高辞职率企业偏好年轻人，但无法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酬与职务晋升机会，因此很难留住员工。而对于无员工辞职的企业而言，由于员工素质较差，但是工资待遇还说得过去，因此这类企业的员工选择留在企业，但是不难推测这样的员工结构是非常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N 中外历史

阳明心学的精神

何俊

从孟子的“心之官则思”，到王阳明的“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儒学关于心的思考与构建逐步完成。心，无论是具象的器官，还是抽象的本体，其存在及其功能与意义都不是孤悬的，而是在心物关系中获得确立与呈现。因此，“心外无物”既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又构成其理论基础。

从心物关系上来确立心的存在及其功能，在西方哲学中亦有经典的阐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其对人的主体性，尤其是理性的彰显，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但比较起来，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固然同样彰显了人的主体性，然而心的内涵却不同于笛卡尔的理性，王阳明指出的是人的整个精神生命。因为这样的区别，笛卡尔导出的是近代西方的知识论与现代性中的理性主义，而王阳明开辟的却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自我型塑。虽然理性认知也包含在生命的自我型塑中，但是，认知在生命的自我型塑中，其权重不如生命践行。因为知识不足以直接构成生命自我型塑中呈现出的力量或者权力，知识只有化入践行，认知才完成使命，知识也才成为真正的知识。心的存在及其功能，自然也远不限于认知，而是渗透到践行。知需要心力，行更依赖于心力。人因为分析的需要，将心力的这一过程划分出知与行，却不幸局限于这样的划分，而不知心力的完整性。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正是弥合知与行的缝隙，使“心外无物”指向生命的整体确立。心不仅仅是理性，因为理性之外，还有情感和意志，以及人未能完全把握到的生命内涵。心涵盖了全部的生命现象，并行于万物，“心之本体无所不该”。

超越笛卡尔的理性哲学，于存在的层面来完整呈现人的主体

性，在现代西方同样获得了强劲的表达。海德格尔指出，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是无方向、无意义的，唯因人的存在，世界才获得意义，人亦同时获得意义。同样的精神在王阳明“南镇观花”的故事中获得类似的表达：当你未看此山中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当你来见到此山中花时，花与心同时焕发。然而，王阳明的心理学毕竟是儒学，与开启西方后现代的存在主义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存在主义固然彰显了生命存在的完整性，但却没有为这一存在规定方向性，而王阳明为心注入了方向。心之本体的内涵是理；只是这个理，不在此，而在那里；呈现这个理，专注这个理，便是良知与良能。人的生命的自我型塑，归根到底，就是将心之良知落于万事万物，致良知为王阳明心学的归宿。

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虽然围绕心的阐明而展开，但却又无不指向心力的落实。因为行动是理性的，所以心不只是理性，而是整个生命的象征；因为生命是有指向的，所以心不只是随意，而是依循天理，合乎良知，良知就是天理。生命不是静止的，而是展开的，心之本体于这个生命的展开中获得型塑，并同时型塑生命本身。因此，事上磨炼，这一生命的展开形式成为心之本体获得型塑的唯一路径。舍此路径，专于心上论说，虽然可以精微，却消除了王阳明心学的淑世情怀；如果不依循天理良知，将事上磨炼视为随波逐流，则又忘却了王阳明心学的仁义本则。这样的流弊，在王阳明后学那里曾经出现过。如果不能对王阳明心之本体与工夫的思想有统一的把握，对本体即工夫有亲切的体会，阳明后学的流弊依然会泛滥，翻新的只是形式而已。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N 有此一说

“制度设计”为什么重要

秦德君

什么是制度设计？为什么制度设计对公共生活那样重要？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一块大蛋糕要分配，怎样才能以最简单、最有效率的办法，尽可能确保分配公正？我们可以通过诸如学习开会、提高“觉悟”的办法，可以通过发文件、规定“几不准”之类的办法，可以通过成立监督小组的办法等，来约束人们，但最管用的办法是设定一条规则：切蛋糕者最后拿取蛋糕。这就是著名的“分饼规则”。根据这一“程序规则”，负责分饼者不可以先拿蛋糕而须在他人选取之后——如果没有这种“他人先取、操刀者最后”的程序安排，权力者为什么不可以把饼切割得有大有小而先取呢？这样的规则创制，就是制度设计，也是政治设计。

作为一种政治规划行为，制度设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从公元前18世纪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法典《汉穆拉法典》诞生，到公元18世纪第一部成文宪法制定；从最初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中归纳出共同的规则，到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原始的公共机构，到今天的科层制；从民族国家的政府体制，到世界范围的联合国组织；从古代的“问策”，到今日的“资政”；从革命年代的战争策略，到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纲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计，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从康有为、汤因比等人“世界政府”的理论谋划，到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蓝图……制度设计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现着风光旖旎的历史画卷。

制度设计有五方面的主要特性：

一是主体性。主体性是指向客体施加逻辑的特性。“人们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混沌的世界之中。于是，为了使生活变得能够忍受，他们力图把秩序

强加给这个混沌世界”（汤因比）。正如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投射意志的光彩，在社会场景中施加着正义的逻辑。

二是理想性。理想性是指对现实不“消极默认”的特性。人类有着向往美好社会制度的天性。历史上理想国、乌托邦、新大西岛、太阳城，一个个充满阳光的理想所，正是这种“天性”的表达。尽管人类生活在“事实”中，但总是保持着超越现实的萌动。理想是人类手上永远玩不腻的玩具。

三是审度性。审度性是对现实秩序否定性审美的特性。其实，“批判性”与“理想性”同处一个维度。政治设计的价值动力，是“任何东西如果永远不去找出毛病，那就永远无法改正”（边沁）。正是这种社会审度意识，促发种种社会解构、建构、重构方案的产生。

四是功能性。功能性是指事物存在独特价值不可替代的特性。政治设计的功能性表现在通过制度结构安排，为社会创造一个可靠的、可预测的行为框架，“个人能够在其中执行他们的计划或项目时多少可以肯定其成功的前景……政治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合理的秩序作为人类自由明智的行动的必要条件。”

五是负荷性。负荷性是指负载前人智力的特性。人很难完全逾越自己前辈的思想框架。社会结构中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正是在集体生活中不断添加。一种政治设计总是既承袭前人，又超越前人。一个时代的真正建树，只是在前人步履上跨出一小步，而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重要的，制度设计是人“族类”本质的外化，是历史主体特定的文化行为。制度设计创造的“社会建筑”，是人类文明创造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系上海学者、公共问题专家）
来源：深圳特区报